

北京、上海、香港——不同宿命的中国城市

程若望 (Thierry SANJUAN) 著

刘健 译

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在中国空间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向东亚和发达国家所展示的现代大都市形象,北京、上海、香港在中国城市当中都可谓与众不同。

在中国城市体系中,这三座特大城市与其他省会城市之间存在一个明显断层。1999年,这三座特大城市的市人口规模大致在700万至1000万之间,而城市人口规模超过400万的省会城市仅有武汉、哈尔滨、沈阳和广州;重庆和天津虽为直辖市,却分别因为地处内陆、城市发展相对滞后以及毗邻北京、城市发展受到一定抑制等原因,城市人口只有640万和530万。

这三座特大城市在中国沿海地区占据着主导和支配地位;改革开放以后,这里成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前沿地带。作为中国发展的热点地区,这三座特大城市成为中国联系其他亚洲城市和西方城市的枢纽,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强大、中国的经济复兴、中国的新型消费方式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它们是中国最主要的增长点,也是展现未来中国发展的窗口。

但是北京、上海、香港三座城市却没有太多的共性,各自不同的历史沿革赋予它们完全不同的鲜明特点。它们曾经担负着不同的城市职能,在中国的政治进程和商业流通中发挥着不同作用,例

如国际交往对北京而言并非最重要的因素,对上海和香港而言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生活在这三座城市的中国人说着不同的地方方言,对于城市归属感、社会行为等问题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显然,这三座沿海城市¹在中国扮演着不同角色、发挥着不同影响。

在此,有必要对这三座城市的城市类型进行分析,借助若干标准对其加以区别,包括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国土地位、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及其作为大城市地区在中国乃至东亚所承担的职能。

为了更好地分析现状、展望未来,首先需要回顾一下这三座城市的发展历史。从“不平等条约”下的对外开放、到民国、直至共产党执政以后的最初30年,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不仅奠定了北京和上海的地位,也间接地推动了香港的快速发展;特别在进入20世纪以后,三座城市分别树立起各自的城市形象,由此形成了当地居民对各自城市特有的期许和盼望。

此外,大都市化对这三座特大城市的类型发展也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这三座城市在中国的空间结构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主导地位,因此在考虑中国国土的组织结构时,只能遵循国土区划的原则;这也是最终形成众所周知的“三个中国”的国土区划的原因。

一 城市与国家政权

外国飞地

中国的城市结构在20世纪经历了深刻变动。在1895年至1911年期间,北京、上海、武汉的人口均达到了100万²。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人口迅速增加,由此拉开了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差距;1936年上海人口规模接近400万,而北京人口规模在1910年以后没有明显增长,人口数量与武汉、天津和广州大体相当³。

此后,中日战争以及中国内战进一步加大了上海与北京之间的人口规模差距;1953年上海人口规模已经达到620万,北京却只有280万,截至“大跃进”前夕,上海的人口比北京多出1.7倍(表1)。

表1：20世纪北京、上海、香港的人口增长

年代	1910	1936	1953	1957	1978	1990	1999
北京	1300000 ^①	1551000	2768119	4010000	8720000	10860000	12499000
上海	1289353	3727000	6204417	6900000	10982800	12833500	13131200
香港	487000 ^②	988000	2126000 ^③	2677000 ^④	4670000	5704000	6721000

注:① 1914年统计数据。

② 1913年统计数据。

③ 1952年统计数据。

④ 1956年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Z. Chen, 1984, p. 70; V. F. S. Sit, 1988, p. 218;《上海统计年鉴》,1991,页60;《北京通史》,1994,页396;Françoise Ged, 1997, p. 109;A. Maddison, 1998, p. 185;《北京统计年鉴》,1999,页69;《中国统计年鉴》,2000,页350、页793。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的行政区划经过多次调整,统计计算方式也在不断变动,导致这两座行政建制城市的人口规模差距不断缩小。目前,上海市和北京市分别以1310万和1250万的人口规模成为当之无愧的特大城市,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了一定数量的农业人口。

同一时期,香港的人口规模却十分有限。20世纪30年代,香港英国殖民地的人口数量仅相当于上海人口数量的1/4,北京市人口数量的2/3,人口规模甚至不及广州。直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中国内战胜利,香港的人口才开始增长;其中大多数是在20世

纪40年代末由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变迁而涌向香港的难民,还有少量在“大跃进”之后和“文革”期间移居香港的人口。

三座城市的国土地位及其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成为决定其各自命运的主导因素。在整个20世纪,中国政府的干预与否、干预方式以及针对不同城市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对这三座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其对中国或外国企业、外国资本和邻国劳动力的吸引均产生了有利或不利的影响。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理论⁴。他认为在帝国时期的中国城市,统治机构的存在往往抑制了通过联合结为“市镇”或城市“资产阶层”的可能;这与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北京作为首都城市,既无法享有上海在1949年以前作为外国租界城市所特有的自由,更不可能像香港那样,作为英国殖民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城市。但是,这种情况在20世纪初期曾经一度变得模糊。例如民国时期,北京不再是国家的代表,甚至在1927年至1937年期间被南京取代而丧失了首都地位;而相反,在1990年以后上海复兴的进程中,国家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由此看来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因为签署战争协议、日本军队占领等政治变数,似乎遭遇了比其他城市更为不利的经历,直到1949年建立中央集权的、有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后,似乎才重新感觉到国家政权的存在对其发展的影响。

但是,上海和香港在20世纪的成功发展并不是因为没有中国政府的干预,而是因为其作为外国飞地的特殊地位使得它们能够在一系列政治危机中始终处于受保护的状态,例如在上海的共产主义中国政治危机,在香港的共产主义中国政治危机。这种发展因素在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回顾上海的发展历史时,都明确指出了外国统治的积极作用。

领土飞地的自身职能是有限定性的。就外国飞地而言,它或

者像中国人认为的那样,是从总体结构中被分离出的部分空间,以便控制其所在国家的领土以及在这些领土上生活的人民;或者像西方人认为的那样,是点状的、边缘化的定居点,以便形成对其所在国家的最终渗透,从印度沿海地区的商行到美洲、非洲的殖民城市和港口城市,莫不如此。1949年,中国被统一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香港重新审视了中国的领土构成,在中国关上了对外的大门之后接替了上海的位置。

今天,在建立上海浦东新区的过程中,再次出现了享有特权的领土飞地的情形。浦东新区是在中国政府宏观调控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由有关当局通过特殊形式的土地开发发展起来的,主要目的是容纳国外投资商及其办公机构、合资公司和服务机构。像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的其他经济特区一样,浦东新区将成为充满活力的发展极核;它不仅要保护当地的经济发展免受外国公司过于急剧的渗透,同时也要保证这些投资商不会因为传统城市中心——浦西的结构转变而遇到生产和社会方面的困难。

历史上,上海曾经被中央政府遗忘,而有时又是垂涎的对象,在经过中央政府多次政策调整以后,终于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重得恩宠,从建立在“不平等条约”基础上的外国租界,脱胎换骨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浦东新区,这无疑是其作为领土飞地的最佳宿命。

上海:被垂涎的大都市

上海不是通过简单嫁接而在长江三角洲发展起来的欧洲化城市。不可否认,它是1842年《南京条约》的产物,但当时它已经是江南商业城市网络中的重要一员。

至20世纪80年代末,除了原有的中国街区外,上海基本上是通过法国租界及其他外国租界(例如英国租界、美国租界、德国租

界、俄罗斯租界、日本租界……)的建设和扩建发展起来的,与人们印象中中国城市的布局秩序和建筑特点并不吻合。但是,顺应运河水系发展起来、构成黄浦江西岸空间组织骨架的道路网络,上海特有的地块划分结构,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建设起来的里弄,所有这些又都反映出上海地区传统农村住宅的建筑风格和布局特点⁵。

那些享有盛誉的高楼、用作办公或住宅的大厦以及法国租界西区的别墅,大多数都建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上海正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得到重建。这些建筑无可争议地证明了现代建筑的胜利,但同时,它们也在无意之中受到了中国建筑以及各种流派的欧洲建筑的启发;例如,从建筑的装饰母题和屋顶形式中不难看出中国建筑的痕迹。其实,上海的混杂恰恰展示了一种始终建立在中国特有的统一协调基础上的国际化现代特色。

在1920年的上海租界,中国人的比重接近98%,外国人仅占2%,而且来自大约20个不同国家。然而,这座港口城市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中期,上海经济开始快速增长,这不仅得益于萨松(Sassoon)或者卡多里(Kadoorie)等外国大企业家,同样也得益于具有相当实力的中国实业阶层。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中国企业家开始进行产业生产活动(纺织、食品……),以取代由于战争而无法继续供应的欧洲进口产品;他们充分利用外国租界所提供的安全庇护,并且充分发挥了上海位于中国沿海中部城市和长江入海口的区位优势⁶。1949年上海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占当年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但是50年以后,这个比重却急剧下降到5%。

上海发展的鼎盛时期恰恰是中国政权的衰败时期,此后它一直保持着中国最大城市的地位。在整个20世纪,中国政府始终把

上海视为已有,利用它来实现重树国家形象的企图,并先后两次制订了宏伟的城市发展计划。其中,20世纪20年代末期,国民党政府曾经在租界城市的西北郊初步建立起“大上海”的雏形;今天,执政当局重新采纳了在传统的租界城市之外建设具有象征意义的新上海的方案,通过开发黄浦江东岸,即浦东新区,将城市一扩为二。

在1941至1943年外国租界被撤除之前,上海的大部分地区归属外国政权管辖;当时的中国政府,即国民党政府,只负责管辖租界外围的城市地区,包括归属中国的上海旧城以及外国租界的北郊和东北郊。这些城市扩展地区对于整合上海的城市空间是必不可少的;基于这些城市建设,南京政府开始试图实施上海的城市发展计划。南京政府的“大上海”计划提出在现有城市的东北、黄浦江的下游建设新的城市中心,由呈罗马“十”字形的行政中心以及与铁路和公路系统相连通的港口组成;新城市中心完全归属中国管辖,并且足以与租界城市相抗衡。然而,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计划实施被迫终止⁷。

在上海之外建设上海,在外国人建起的城市之外建设中国的大都市,这个发展计划由此便被束之高阁。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最初30年里采取了反城市的政策,主张把中国的大城市从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这使得上海除卫星城建设外,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扩展,甚至包括原有工业建设和住宅建设的现代化,即使是卫星城建设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失败的。相比之下,政府更加重视建设首都北京,因而对上海实施了十分不利的财政政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重新启动了建设新上海的计划,该计划的规模已远非30年代国民党政府制订的上海城市发展计划所能相比;它不仅提出在黄浦江东岸尚未开发的土地上建设

城市新区,而且提出对位于浦西的传统城市进行更新,从根本上重构道路系统和空间布局。这个计划的实施直接体现了中国中央政府的能力,尽管10年前还曾有外国专家怀疑开发浦东的可行性;浦东新区的成功发展,包括各种项目的实施以及目前的城市景象,使人们不难衡量中国中央政府在浦东新区土地开发中的有效付出,对如此巨大的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影响的掌控,以及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能力。

中央的领导者们通过做出促进上海复兴的政治决策,对保证上海城市发展计划的成功实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其中又有两位曾经是上海的老市长——江泽民和朱镕基。另外,这个发展计划的成功实施还得益于一场史无前例的国家和国际运动。在此进程中,传统的外国租界城市成为中国政府实施对外改革开放政策的特殊武器。根据官方的目标,在中央政府的严格调控之下,上海将借助于北京的支持,在短期内发展成为亚洲的主要大都市之一,并与香港展开竞争。

北京和香港:20世纪的两种宿命

北京和香港作为两个极端的案例,展示了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过去到现在,这两座大城市始终向中国社会展示着两种基本的发展选择:一种发展重视体现中国在世界的民族独立和民族力量,另一种发展则是基于参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外向型发展。历史上,国外因素对北京发展的影响一度锐减;但就香港而言,与新加坡和台湾相比,它在行政管理和人文文化方面仍然缺少中华民族的特点,因此国外因素对其发展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在20世纪后半叶,恰恰是国家政权,包括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决定了这两座城市的命运。

北京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展现了中国的遭遇:日本侵略、恢复

首都地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此后，北京重新提出了实现国家统一这个在中国皇权时代已经延续超过2000年的理想。新政权最终落户在位于紫禁城西侧的中南海；共产党政权通过建立与皇家宫城之间的这种象征性联系，确立了它的合法地位。显然，北京的首要职能不是经济中心，而是凸现国家和中国政权的回归。

这种政治意愿在城市空间上也得到明显体现，从城市空间结构到由于汽车交通增长而出现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对上述特点的深刻表达。例如，新的城市建设大多采取了在旧城内见缝插建的方式，方格网状的道路系统与皇权时期的道路体系并列而置，建设天安门广场和宏伟大道，等等。在此，国家政权以两种不同的表达方式，通过城市景观得以体现。

皇家政权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宇宙概念的基础上，认为皇权是大地的中心，皇帝是天与人之间的桥梁；因此皇家政权的表达方式不是直截了当、一目了然的，而是通过城墙、城门以及各种文化建筑的暗示。例如，从紫禁城、到皇城、再到内城，所有建筑无不遵循格网布局的原则，而且建筑高度不得超过、甚至不能等同皇家宫殿的高度；内城以南作为经济活动和大众生活场所的城市，虽然与皇权城市比邻而居，但实际上被排斥在皇权城市之外的。

此外，北京的城市空间还因为政权的规定而被切割、分离。例如，北京的居住空间是以胡同为单位组织起来的；所谓胡同通常是一些正方形或长方形的街区，内部通过一系列的小街巷相互联系，街巷两侧是少有开口的高墙，偶尔有木质大门通向围绕方形院落的住宅。

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的城市发展受到前苏联模式的重要影响；但与皇家政权不同，共产党政府希望通过人们的视觉感受来体现其权力的存在，能够将其权力在城市空间中生动地表达

出来，以庆祝其为解放中国而进行的斗争以及斗争的最后胜利。

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领导者们就将北京的城市规划建设列入当时的重点工程名单。长安街成为一条东西向的新轴线，在天安门广场的位置上将皇权时期的南北向传统轴线一分为二；南北向的传统轴线被重新规划，在拓宽的同时被大大延长；为了举办庆祝新政权诞生的重大仪式，建起了向外界展示强大政权的纪念碑式建筑：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1977年，在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位置上又建起了毛泽东纪念堂。1959年，北京陆续建成了其他一些重大工程，包括北京火车站、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钓鱼台国宾馆、农展馆、工人体育场、美术馆、华侨大厦等。

当权政府既没有试图拆毁这座城市，也没有试图削弱它的中心地位，而是在古老的皇权首都的中心，不断增加新的建设。因此在本质上，北京的城市肌理并没有改变，只有城墙被逐步拆除，继而在原址上建起了一条地铁线和一条环路。同样，城市的土地规划也充分尊重了城市空间的原有秩序，在旧城以西集中建设了各大部委和行政办公机构，在旧城以东建起了使馆区（三里屯）以及主要面向外国人服务的宾馆、商店（建国门外）。

然而，像世界上其他地区一样，这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城市体系并非没有其不利的一面，那些供民众欢庆的场地同样可以成为大众进行抗议示威的场所。正因为如此，这些地方总是处于警察的监控之下，而且每当有重大庆典时，当局总是小心谨慎地对每个参与者进行认真的安全检查。

与北京相比，香港可以说是一座没有国家政权的城市。20世纪，香港一直保持着外国殖民地的地位，这使它可以远离从共和主义中国到共产主义中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变故。过去，香港始终是一块封闭的飞地，甚至比上海的外国租界还要封闭；在相

当长时间里,香港对中国大陆的认识基本上就是大批涌人的难民。对这些难民而言,香港就是一块领土飞地,可以在他们最终离开远赴他乡之前,为他们提供庇护和保护。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香港和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开始真正改变。香港从原来的免税港口、与 1949 年以后的共产主义中国进行交流和接触的秘密地点,摇身成为向中国大陆传播信息、提供资金和产业活动的地区中心。香港的地区化发展趋势以及 1997 年的主权回归深刻改变了香港在中国空间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香港的成功还取决于英国殖民者在绝对自由的经济背景下赋予香港的经济地位。在英国人看来,殖民地不过是一个商业中心和交流中心,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因此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他们一直在香港实施注重实效的行政管理,通过加快香港对内和对外交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制定实施宏伟的土地开发规划(卫星城建设),建设大量的公共住宅以及教育设施和医疗设施,努力为促进当地的经济繁荣创造条件。英国人关心的不是如何建立一个属于香港人自己的政治实体,而是如何确保香港的政治安全,如何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如何保持高技能低成本的劳动力供应。他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启动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而且直至 1992 年彭定康(Chris Patten)执政以后才开始加快这一进程。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1982 至 1984 年,有关香港回归的商谈就在香港居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伦敦和北京这两座城市之间悄然展开³。

随着香港的中国人对北京政府畏惧心理的增长,公众意见变得明确起来。1989 年之后,关于香港的身份、香港的命运、建立代议制政治体系的必要性的认识开始逐渐形成。

在殖民主权移交的过程中,中英双方政府不断强调香港的经济地位,并且拒绝赋予它太多的政治色彩。因此,董建华及其领导

小组在提交官方计划时,明确提出要首先确保香港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同时改善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虽然香港的土地主要分布在岛屿或半岛上,而且由于地形条件新界被分隔在香港岛之外,但是香港自古以来就拥有可以脱离大陆自成一体的城市空间和港口,这与上海的租界有很大不同;后者只是城市中的几个街区,必须依托相邻的其他城市街区及其与长江三角洲的联系才能生存。1964 年,香港的英国政权与广东省达成协议,同意香港本岛使用东江的部分水源,并且接受由珠江三角洲提供的农产品⁴。

这种空间自治的可能性强化了香港经济的外向型特点。香港选择发展以出口加工为主的轻工业以后,经济增长十分强劲,很快就成为亚洲最主要的经济区之一,并且迅速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之中。作为诞生于 1842 年的自由经济区,香港为外国企业提供了极具吸引力的有利条件;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香港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之一、亚洲四大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之一。

此后,伴随经济结构的必要调整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香港进一步强化了它作为港口枢纽和航空枢纽的职能,重视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特别是高水平的第三产业,从传统的制造业中心逐渐蜕变为地区性的服务业中心;同时,香港也兼顾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主权移交时它已成为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结点。而香港作为自由经济的首府,国家政权在这里只发挥计划管理者的作用。

二 中国复兴进程中的不同城市职能

沿海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值此 21 世纪伊始,北京、上海、香港三座城市从此归属了同一

个国家政权。从政治角度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分散化同时并存。随着香港回归并继续实施自由经济政策——尽管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自由经济因为香港政府的干预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加之市场经济在中国大陆的逐步发展，在这三座城市之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功能换位现象，从而将其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中国正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在这里到处都存在着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因此必然导致区域重构的出现；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加大了对除上海和北京以外的其他重要结点城市的发展力度，区域重构的速度不断加快。

实际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才冒险对大城市进行彻底的同时也是充满艰险的现代化改革。城市规划由此得以实施，同时也搞乱了历史遗存的建成空间。至今，中国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以及某些内陆城市如重庆，已经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首善之区。

按人民币现价计算，仅在1996至1999年期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就增长了39%，北京增长了35%，全中国平均增长了21%；在中国的各省市当中，除了福建（增长37%）和西藏（增长63%，但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1亿元）以外，上海、北京两市的经济增长最为强劲。同期，上海也逐步扩大了与北京的差距；例如1999年，上海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超过5%，北京所占份额不足3%。这两座城市均位于中国的经济发达地区，并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例如1999年，上海连同江苏、浙江两省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1%，北京连同天津一市、河北一省所占的份额也达到了10%¹⁰。

但是世纪之交，香港及其毗邻的广东省依然中国沿海地区最为重要的经济中心。1999年，仅广东一省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就超过了10%，当年香港投资占全国外资的比重也达到41%；1995年时，这个比例曾高达53%¹¹。这表明，香港始终是投资者和企业家通往中国大陆的首选途径。

从中期发展来看，这三座沿海大城市应该保持怎样的均衡关系？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快速发展，香港作为中国大陆和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经济过滤器的作用在逐渐衰退；届时，这些因素是否会导致香港陷于平庸？是否会使这三座主要沿海城市归为统一和重新平衡？未来，香港、北京、上海是否不再仅仅是主导中国的最重要的沿海地区的地区性大城市，而是通过与东亚大城市网络的整合，成为国际性大城市？各个城市的特性，例如北京的政治职能和香港的经济职能，是否会因为产业活动的多样化以及其中某座城市的实力提升而逐渐融合？

毫无疑问，21世纪将是这三座城市激烈竞争的时代；即使中央政府在左右着北京、鼓励着上海在大陆的发展、同时控制着香港，三个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以及当地居民也必须参与到激烈的竞争中去。

目前，虽然部分中国企业家（例如李嘉诚）或者中国机构（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在中国沿海地区无处不在，并且地区性的企业集团尚未形成，但地方主义和地区保护主义在中国依然十分盛行；即便有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要消除这些现象也是很困难的。

显然，最好的结果是三座城市建立起互补的关系；事实上，三座城市所处的地区已经在某些产业领域形成了自己的专业化特点，例如广东的家电制造业、上海的汽车制造业。就第三产业的发展来看，交通通讯是广东省的强项，而金融服务和科学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方地区；如果考虑到香港的影响，华南地区有可能在金融领域与上海一争¹²。

今天，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三座城市在各自方向上的共同发

展,每座城市都拥有自己的独特优势以及历史遗留或后天形成独特特点: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通道;北京既是国家首都,又是地区性城市,与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其他中国城市共同面对工业转型的困境;上海则是展示未来中国现代化的窗口。即使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特性将趋于弱化,中国的现实发展也会有足够的理由,要求三座城市保持这样的职能分工。

三座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的产业构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个城市的特点(表2)。

表2:1998—1999年北京、上海、香港的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北京(亿元,1999)	2174.46	87.48	840.23	1246.75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4%	39%	57%
上海(亿元,1999)	4034.96	80.00	1953.98	2000.98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2%	48%	50%
香港(亿元,1999)	11824.27	15.30	1793.90	10015.07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0.1%	15%	8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页61、页800。

香港的第三产业十分发达,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85%;相反,工业发展却因为两方面的原因急剧萎缩。一是工业生产需要大量劳动力和生产空间,附加值不高且常常伴有污染,因此最终遭到遗弃;二是大量工业企业向珠江三角洲地区转移,目前在珠江三角洲有大约300至400万人在为香港的企业工作。同时,香港的第三产业也进行了结构重组。一方面,低回报的服务业

被转移到大陆,例如部分港口货物被分散到深圳港以及中国的其他港口;另一方面,香港对转移到大陆的服务业实施远距离管理,同时在本岛向企业提供高质量的生产服务(金融、保险、法律、咨询……)¹³。

至于北京和上海,它们十分清楚自己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特别是由于历史遗留的建成空间所引发的困难,在共产党执政最初30年的政策指导下城市急剧工业化所产生的后果,以及国有企业生产转型和社会保障消失所带来的令人生畏的挑战,等等。尽管如此,这两座城市的原有职能并未改变:在上海,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出可谓等量齐观;在北京,第三产业日益显现其优势地位。

城市个性与城市工地

为了促进发展、取得国际性大都市的地位,中国大城市还有赖于向民众、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甚至国际机构展示自己的城市形象。在与其他城市的竞争中,城市形象是城市政府可以运用的宝贵武器,其个性不仅源于城市历史,更源于居民的社会行为、主观能动和热切愿望所表达的城市文化。

无论从城市自己发表或外部强加的官方言论,还是从日趋复杂的发展现实来看,我们都很难对某座城市的“城市个性”加以明确定义,也很难确定使这座城市有别于其竞争对手的那些价值观念。然而,对城市个性的考虑却是支撑各种城市发展计划的基本框架,也是支持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北京、上海和香港,它们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些城市的居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绵延生息,由此导致它们各自不同的发展进程、各自不同的城市个性以及在城市空间中留下各自不同的象征性标记,进而使这三座大城市在中国沿海地区独树一帜。

然而在这三座城市中,中国城市的独特个性却在以不同的方

式衰退。

在北京，人们希望看到的是与中国政治历史休戚相关的北京人，因为在这座城市中有如此众多的遗痕每天使人都在回忆着历史；人们希望看到的是承袭了老舍笔下卑微城市居民特点的北京人，他们生活在四合院住宅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元代。然而在 20 世纪末的北京城市中心，国家的伟大工程与难以适应现代生活的传统空间比肩而立。显然，姗姗来迟的历史遗产保护政策以及以位于皇城北部的平安大街建设为代表、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建筑更新¹⁴，都直接受到了上述第一种认识的启发；尽管从城市中心到城市外围，历史遗产面对新的交通干道、办公大楼、宾馆商场的建设，仍在与之进行着艰难的抗衡。

至于上海，它的首要个性在于它是一座大城市，所谓上海人也是一座大城市、而且是目前中国最大城市的居民。其实，这座传统租界城市的居民并非来自上海，而是来自上海周边的江苏和浙江，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的其他省份。这些人的曾祖、祖父和父辈来到城市，就像在法国人们慕名来到巴黎。因此，上海文化在具有国际化特点之前，就首先表现出大同的特点；它吸收了中国不同地区最好的饮食特产，吸引了全国最好的人才，并且为他们创造了比其他地方更好的社会交往条件。同时，上海人也希望自己是有教养的人，对文学创作、电影作品、时装以及所有新鲜事物充满兴趣。事实上，就像北京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样，上海也有许多著名的高等院校，例如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等等。1998 年，上海市政府在传统租界内为数众多的老剧院和电影院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国际竞赛，由夏邦杰设计事务所和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共同合作，建设了具有象征意义的上海大剧院；与此同时，北京的国家大剧院还在筹建当中。建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上海大世界，因汇集了众多的游艺厅和演出厅而

在上海显赫一时；如今，上海到处都是绚烂多彩的城市照明、五光十色的餐厅、酒吧、夜总会，可谓重现了上海大世界的风采，使得上海即使在夜晚也是一座活力四射的城市。

老舍是生活在北京土地上的作家，一生描写的都是首都特有的生活氛围。而关于上海，在 1949 年以前最著名的小说要数茅盾的《子夜》，它描写了上海的商界生活及其在资本主义城市的堕落。今天，上海文学关注的是上海市民的生活，他们曾经是“文革”的受害者，如今必须面对新的生活节奏，面对企业或政府强加的种种难题，面对社会迁升或个性发展的梦想时时破灭的痛苦。

上海是一座文化之都，但它代表的又是哪一种文化呢？从位于黄浦江沿岸外滩上的各类保护建筑——中国银行、和平饭店、海关、汇丰银行（现为浦东银行总部），到城市道路、房屋住宅以及正在快速消失的里弄，所有这些城市景观无不带有近代（1842—1949）西方文化的痕迹。而且，上海文化中的外国印记不仅仅是形的历史遗产，还包括对新事物、新发明和现代化的态度；这种现代化最初是在欧洲发达城市的影响下引进的，继而又受到美国城市的影响，今天则更多地受到香港或日本城市的影响。

在本质上，上海文化自称是现代的中国文化，上海市政府和当地市民希望通过彻底的城市更新来实现城市复兴。然而就像 20 世纪 20 年代那样，由于担心上海自身的可靠性，城市现代化最终变成了拆除传统城市肌理和建设新的城市街区。在此，上海文化又与古老的中国传统相吻合，即把历史遗迹的精神本质与其物质载体相分离。20 世纪 90 年代，在浦西出现了众多的办公大厦或宾馆高楼（希尔顿、波特曼），高架高速公路由南向北（成都路）、由西向东（延安路）穿越城市或者环城而行（中山路），各类房屋建设迫使大批居民迁往城市外围，苏州河沿岸的工厂也将土地让出，用来建设集合住宅、休闲场所和公园绿地¹⁵。

在外滩对岸的浦东,始于陆家嘴中心商务区的世纪大道(5公里长、100米宽)成为这个广阔新区的主要干道;此外,这里还建设了新的国际机场,远期将通过地铁2号线与浦西虹桥机场相连,在长江沿岸建设了新的港口(外高桥),并且建设了金桥和高桥两个开发区。金桥开发区主要接纳没有污染的工业企业,产品涉及微电子、电子通信、家用电器、汽车等多个领域,主要供应国内消费市场。在高桥和外高桥,目前已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十余家企业落户,包括惠普、IBM、飞利浦¹⁶。

对上海而言,目前是重修城市与其最初形象之间相互关系的最好阶段。中国政府,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城市政府,都希望把上海建设成为展示中国现代化的窗口,或者至少是展示中国大城市现代化的窗口;而且,中国领导也大力支持上海的再发展,他们只是担心为了在房地产开发、城市规划、工业和第三产业上吸引外国投资,应该如何解决那些由于缺少定期总结而变得含混不清,甚至已经成为阻碍上海、乃至整个大陆发展障碍的问题。

城市功能的现代化往往伴随着城市形象的现代化。上海市政府决定在城市景观的核心地区,利用强烈的建筑形象来展示这座大城市的复兴。作为进入上海这座港口城市的人口,外滩一线的建筑立面曾经是上海城市形象的标志;今天在它的对面,新建的东方明珠电视塔(1994)和金贸大厦(1999),又赋予上海以新的形象标志。其中,前者位于黄浦江的转折点上,是由三个球体通过线状组合而成的高塔;后者的外形设计则明显受到中国古塔,或即将成为世界最高建筑的世界国际中心的启发。

上海市政府曾计划将办公地点从外滩迁往浦东,后来又重新调整了规划,在位于浦西中心位置的人民广场上,建起了高大的市政府大楼,成为近代上海的第二高度,与上海博物馆(1994)和上海大剧院鼎足而立。人民广场所在的位置是原租界区的跑马场,

它的建设象征着今天的上海已经完全取代了那座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被外国人管辖的城市。

此外,在原本属中国管辖的上海旧城里还建设了一个具有江南建筑风格的传统街区,这不过是为了还上海以中国特性的人为企图,显然是对城市的曲解,最终目的不外是取悦游人。

对比上海,北京却没有其他具有象征意义的发展计划。从为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而修建的平安大街,到将作为2008年奥运会会址的亚运村,再到新的国家大剧院以及强调保留在皇权时期和20世纪50至70年代建成的象征性标志的城市规划,所有这些都不能反映新的城市个性。与上海相反,作为国家首都,北京似乎不能完全依靠自己来承担市场经济的中国的发展计划,它所拥有的财政来源、国家承诺及其对外开放的程度似乎也不允许它这样做(表3);要知道,当上海表达与香港相抗衡的发展意愿时,国家承诺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表3:1999年北京和上海的对外开放

	外国直接投资	对外商业	进口	出口
北京(亿美元)	19.75	343.60	244.56	99.04
上海(亿美元)	28.37	386.18	198.19	188.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页601、页609。

在历史上,北京就不像上海那样,与外国模式和国际现代化保持着密切接触;很显然,这种密切接触在香港也同样存在。但另一方面,国家首都似乎在以对自己个性的肆意破坏为代价,在其原有城市肌理和古老风俗习惯的基础上,不断叠加新的现代化象征;在这方面,上海则发挥着源自其历史和城市自身形象的过滤作用。当

然与上海不同,北京的职能更多地是表达中国而不仅仅是其自身。

严格地讲,香港目前所面临的挑战不是城市规划。香港是一座发达城市,主权回归的影响并不能在城市空间的尺度上直接反映出来。要看到,中国政府始终坚持要把古老的殖民地逐渐占有;同时也要看到,香港本岛的优势还存在于另一个空间尺度上,即与中国沿海地区竞争对手的地区抗衡,包括在中国以及在亚洲。

香港岛所面临的惟一挑战在于它的人口密集和空间狭小。如果北京、上海、香港拥有相同的城市人口规模,那么从建成空间的面积上就可以看出,香港的密度特别高,迫切需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表4)。但是很难想像,中国政府会冒险把特别行政区的范围扩大到毗邻的深圳经济特区,从而将这个经济中心推向比古老的殖民地更加不利的境地,而且违背香港中国人将自己区别于大陆中国人的吹毛求疵的意愿,要知道前者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大都市的居民。然而,城市空间的重新扩展可以扩大最近以来的工业空间区位调整的范围,加强从香港遥控大陆的服务业发展;实际上,这种情况在港口方面已然出现。

表4:1999年北京、上海、香港的城市人口及其密度

	建成空间(km^2)	城市人口	人口密度(人/ km^2)
北京	488	7472000 ^①	15303
上海	550	9696300 ^①	17643
香港	184	6721000 ^②	36527

注:①不含农业人口。

②全部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页350、页353、页793、页797。

三 中国空间结构中的大城市 ——区域发展的参与者

中心—边缘关系的解读

在中国,北京、上海、香港均位于交通干线的起点或交点上,不仅是主要的移民目的地,更是发展中中国的主要增长点。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地位,使其在空间组织中亦发挥着结构性作用,从沿海地区一直深入到整个国土。

三座城市相互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承担着不同职能,在各自地区发挥着不同作用;由此可见,并不能把中国沿海地区看作是惟一的、严密的整体,以它为中心来组织中国的国土空间,同时把中部地区看作是毗邻中心、部分融合的外围,或者把中国西部看作是欠发达的、难以控制的边缘。

鉴于中国的统计以省为单位,在编制总体规划、需要区分具有明显不同特点的地区时,划分为“三个部分”(沿海、中部、西部)的做法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是,国土区划并非是国土的空间组织;无论是对北京、上海、香港的城市类型分析,还是对其城市竞争力和区域竞争力的分析,都很容易揭示出上述宏观区划的不合理之处。毋庸置疑,中国的国土空间可以按照中心—边缘模式的原理,以这三座大城市为中心进行组织。

针对中国国土空间的中心—边缘关系,阿兰·雷诺(Alain Reynaud)¹⁷曾做出过解读。他认为中国国土有三个中心,即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广州,这些地区中心,加之经济特区以及在其辐射范围之内的开放港口,通过融合位于中心外围的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在沿海地区不断延伸;处于最边缘的地区是指那些相对于沿海地区而言无法融入整体的地区,但它们同样保

持着以汉人为主的中国人口密集的特点，如在远至四川的中国内陆。最后，阿兰·雷诺照例把西部人口稀少的地区（内蒙古、新疆、西藏）认为是“战略盲角”。

然而，对这三座沿海大城市的认识过于划一却使上述分析方式的合理性受到局限。事实上在中国的国土空间中，这三座城市中的任何一座都在发挥着不同作用，其辐射范围也随着所选用的判断标准的不同而变化。由于缺少对三座城市各自特点的描述，导致无法在它们之间以及在正处于发展进程中的中国主要地区之间进行功能等级划分；在城市尺度或小区域尺度上对各个城市地位的分析，也无助于清楚地认识为什么这些城市会在整个中国成为具有不同特点和不同作用的中心。

因此，要评价北京、上海、香港在中国国土空间的影响，需要以对这三座城市的功能等级分析为基础。

这三座沿海大城市在空间上有着不同的辐射范围，例如北京的辐射范围包括西藏，上海的辐射范围南至福建；而且依据不同的判断标准，三座城市在中国空间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例如北京是华北广大地区的政治、经济、城市中心，并且希望成为西藏自治区的民族政治中心。同时，三座城市在空间上的辐射范围既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呈不连续的分布状态；例如香港是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但香港投资在中国内陆的分布，构成了在整个国土上呈点状分散布局的地理现象。

这些辐射区的空间范围不同、功能特点不同、空间结构不同，可以根据各自的中心以及所选用的不同标准重新划分，因此其与中心之间的距离和可达性并非是决定性的。有意思的是，香港在上海或北京的投资把这两座中国大陆城市纳入到古老殖民地的经济辐射范围之内。相反，那些所谓“盲角”可能只属于某一个辐射

范围。例如，位于中国西南边境的云南是众多少数民族聚集的省份，它只属于北京这个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辐射范围；这个在地域上十分封闭的地区面临着种种发展困难，从而使得香港的影响不断衰退，上海的影响更是小到不值一提。

类型标准与城市功能等级

以三座沿海大城市为中心来组织中国空间结构的原则是建立在三种类型标准基础上的，即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

政治标准占据首要位置，因为国家希望拥有国家统一（针对最富有省份的自治意愿）、国土完整（针对新疆和西藏的汉化和独立要求）、国土安全（针对国境边缘）的政治和军事保障；特别在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现行政权一贯强调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就更有理由赋予政治标准以首要地位。

经济标准不只是指各个城市或其所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不只是工业生产总值，它同时还指人员、资金、信息、知识、服务、商品的流动，暗示着在广阔的中国国土上分散中心和整合中心的存在。显然在这方面，三座沿海大城市所掌握的竞争武器是不同的。此外，经济标准还表现为国家和地方有关促进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向投资商提供的优惠条件以及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例如已经成立的开发区。

1996年重庆成为直辖市，被赋予中国内陆增长极的新职能；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长江流域进行了新的规划。这些更加突出了长江流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的重要地位，并将使地处长江出海口的地区中心——上海在与北京和香港的长期竞争中受益匪浅。

比较而言，文化标准更加微妙，但并非不重要，它主要表现在城市在推动改革和现代化、通过研究和教育机构对劳动力进行培

训、建立城市形象、吸引外来人口等方面的能力上。城市是否具备成为国际性城市或者进行国际化进程的能力,这已经成为城市规划者手中的一张王牌,从北京到上海,城市政府对此都予以高度重视。这种能力可能仅仅表现为年轻学生掌握外语的程度以及城市为企业家、外国人和旅游者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

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对三座沿海大城市的功能等级划分来表述中国的国土空间,即:北京是整个国土的政治中心;香港是中国经济开放的核心;而上海则是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尽管它的辐射范围可能没有遍及整个疆土。

三座沿海大城市——具有不同辐射范围的地区中心

北京的经济地位要低于上海和香港,但由于国家首都的政治地位和它在国际上的地缘政治地位,其辐射范围却最为广泛,遍及整个中国国土。它是中央政府和共产党政权的所在地,其政治和行政特点十分突出。正是在北京,中国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促进上海及浦东开发、支援内陆相对欠发达省份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国土规划,2000年3月又做出了把西部经济发展纳入国土开发计划的决定。

中国中央政府强烈认为,针对过去的计划经济,所有的改革都必须是逐步进行的;而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北京的中央政权希望以国土整合和发挥领导作用的名义,继续保留调控的权力。例如在深圳,中央政府就试图越过广东省政府实施直接的行政干预。

从地区尺度看,由北京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主要城市包括北京、天津、唐山。其中,北京在整个地区居于首位,天津和唐山主要是工业城市。目前,这些城市共同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所占份额)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中心(上海)和华南地区中

心(香港—广州)的竞争挑战。

从更大的空间尺度看,交通网络发达、经济结构雷同、缺乏竞争对手,这些因素使得北京拥有广阔的辐射范围。其中在东北地区,其辐射影响甚至远至黑龙江的边境城市,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联系使得这些黑龙江边境城市在经济上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在华北地区,其辐射影响向西可至山西、向南可达河南和山东。

相对于北京,香港自视为发达的、现代化的和国际化的都市。自古以来,它就是东亚的中心;它辐射中国大陆的基础是其应对遍布中国沿海及内陆的众多开放中心的挑战的能力。香港最直接的辐射范围是位于广东中部的河流谷地,即珠江三角洲地区。目前,香港已经成为广东省的经济要地;广州不过是广东省的政治中心,而且这也是广州相对于香港的惟一优势。为了有利于今天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发展,20年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就开始进行空间重组、经济分工和工业迁移¹⁸。香港是新兴工业化地区,而广东长久以来就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地区,香港—广东的中心地位因为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不断强化,甚至无需理会上海和北京地区的发展。

如果香港要将其辐射范围扩大至覆盖华南大部分地区,甚至包括海南岛,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这里不会出现另外一个和它同样具有整合能力的大城市,来影响那些在地域上封闭、在经济上依赖北京(例如云南、广西)或者台湾(例如福建)的地区;同时,它还必须与上海——这座位于华东地区的著名城市展开竞争。

其实,香港的发展目标是使其辐射范围遍及中国对外开放的全部国土;这个辐射范围并非是连续的空间,而是具有点状和多中心的特点,其中包括了绝大部分的中国对外开放极核,即那些依托对外开放城市和对外开放经济区发展起来的经济特区,例如在中国沿海地区向北直至华北的北京或大连,在内陆地区向西直至重

庆和成都。同时,像上海或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还可以凭借当地基础设施条件和地区中心地位,成为接替香港的后备力量。

来自香港、台湾、日本、美国、欧洲以及海外华侨的投资,或是转道香港进入大陆,或是将香港岛作为投资总部,其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中国城市的空间重组(道路、地铁),同时还包括各种房地产项目(商业中心、办公楼、住宅)以及合作进行企业生产和商业经营的协议。

1978年以后,当代中国的发展在地理上是不连续的,但不乏结构性特点,香港即成为其中的主要中心;尽管目前,随着外国投资商、台湾投资商与大陆开发商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直接,加之以上海和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大城市的崛起和发展,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独霸地位正在逐步消失。

就上海而言,它既不具备政治中心的职能,也不具备作为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达城市的地位;它的优势在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北京政府为了抗衡华南地区的发展而鼓励中国大陆城市复兴的政治意愿——在中国大陆的城市中,上海的首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20世纪80年代,广东在香港辐射影响之下的快速发展曾经在中国产生了颇具危险性的负面影响;正是鉴于此,中央政府做出了在其国土上实现南北之间平衡发展的政治决定。

尽管至今,上海仍以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自居,但其辐射范围与北京和香港不相上下;其地区辐射力遍及长江三角洲以及江苏省和浙江省,并且向西延伸至武汉,未来借助于正在进行的三峡地区的开发建设,其辐射影响甚至可远及长江上游地区。这足以证明,上海作为华东地区首位城市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但同时,上海也必须面对在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由于相邻城市的快速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地区抗衡。例如,1979年经由上海的出口额度占当年中国出口总额的14%,到1992年这个比例

已经下降到2.3%¹⁹。

通过浦东新区的开发建设中心城市的现代化将上海变成中国的窗口,这使得上海面临着诸多挑战。上海的形象及其历史向世人展示的是一座具有国际现代特色的开放城市,加之其建设中央商务区、工业区以及大型港口和空港基础设施的大胆计划,上海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中国最大城市的称号,而是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和现代化大都市,成为21世纪能够打破中国地区平衡、最具活力的中国沿海地区中心。

四 结 论

在对外开放和推行市场经济的中国,尤其在最近几年,北京、上海、香港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在多个领域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局面。例如,它们都希望代表中国成为亚洲发达地区的中心;它们在不同地区占据着同样的主导地位,以不同方式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在展示中国强大的同时,还在展示着不同地区的强大;它们都是展现中国发展的政治窗口和文化窗口,各自特点的相互比较恰恰明确说明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矛盾。

21世纪,这三座城市的发展应该建立在不断加强的地区化、多样化和三产化基础上;尽管其在各自地区的首要地位毋庸置疑,但它们同时也应该考虑周边其他城市的发展。从地区的角度看,它们与周边城市的经济互补联系——天津与北京,南京或武汉与上海,广州或深圳与香港——还取决于具有浓厚地方主义色彩和激烈竞争意味的发展,并且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有待于重新界定。

从国际的角度看,台北或高雄以及其他东亚大城市(东京、汉城、新加坡……)与中国大城市之间的跨地区联系亦在不断加强;在中国海沿岸地区,城市之间特有的相互联系似乎暗示着所谓

“亚洲地中海”的出现。但是鉴于亚洲正在经历着深刻的结构重组,城市之间的竞争和对立还将不断增加。

从长远来看,这三座中国大城市融入亚洲的整合过程可能会导致中国沿海地区与其他内陆地区之间的割裂。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国土是如何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分享着三座城市各自的辐射影响。毫无疑问,未来北京、上海和香港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地位和文化地位将不断得到加强,而不是继续保持地区隔离的状态;对它们来讲,这也是获取足够的力量以面对严峻的国际竞争的惟一跳板。

[注释]

- 1 在这里,北京之所以被称为沿海城市,是因为它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
- 2 G. W. Skinner, 1977, p. 682.
- 3 Z. Chen, 1984, p. 70.
- 4 M. Weber, 1982, p. 37-47.
- 5 F. Ged, 2000.
- 6 M.-C. Bergère, 1986.
- 7 F. Ged, 2000.
- 8 T. Sanjuan, 1996.
- 9 T. Sanjuan, 1997, p. 93.
- 10 《中国统计年鉴》,2000,页53、61。
- 11 《中国统计年鉴》,1996,页598。《中国统计年鉴》,2000,页606。
- 12 J.-J. Boillot, N. Michelon, 2000, p. 25-26.
- 13 F. Gipouloux, 1999; F. Gipouloux, 2000.
- 14 T. Sanjuan, 2000, p. 135.
- 15 F. Ged, 2000.
- 16 B. Rui, 2000, p. 12-13.

17 A. Reynaud, 1997, p. 173-194.

18 T. Sanjuan, 1997.

19 F. Gipouloux, 2000, p. 6.

参考文献:

- 《北京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 《北京通史》,北京:中国书店,1994,第10册。
- BERGERE M.-C., *L'Age d'or de la bourgeoisie chinoise 1919-1937*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1919—1937), Paris, Flammarion, 1986.
- BOILLOT J.-J., MICHELON N., «La nouvelle géographie économique du monde chinois» (新中国经济地理),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59, 2000, p. 14-26.
- BURGEL G., CHEN G., SANJUAN T. (eds), *Villes chinoise* (中国城市), *Villes en parallèle*, no. 23-24, 1996.
- CHEN Z., *China. Essay on Geography* (中国地理论文集), Hong Kong, Joint Publishing Co., 1984.
- GED F., «Shanghai: habitat et structure urbaine 1842-1995» (上海 1842—1995:城市住宅与城市结构), Paris, thèse (EHESS), 1997, 2 volumes.
- GED F., *Shanghai* (上海), Paris,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itecture, 2000.
- GENTELLE P., «La ville et les pouvoirs» (城市与政权), in GENTELLE P. et al., *Chine, Japon, Corée* (中国、日本、朝鲜), Paris, Belin-Reclus, 1994, p. 100-111.
- GIPOULOUX F., «Hong Kong plateforme mondiale pour les services à forte valeur ajoutée?» (香港:高附加值服务业的世界平台?),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54, 1999, p. 105-107.

- GIPOLLOUX F., « Hong Kong, Taiwan et Shanghai : plateformes logistiques rivales du corridor maritime de l'Asie de l'Est » (香港、台湾、上海：相互竞争的东亚沿海后勤平台), *Perspectives chinoises*, no. 62, 2000, p. 4–11.
- HENRIOT C., ZHENG Z., *Atlas de Shanghai. Espaces et représentations de 1849 à nos jours* (上海图集：1849至今的城市空间及其表达), Paris, CNRS éditions, 1999.
- LO C. P., *Hong Kong* (香港), Chichester, Wiley, 1995.
- MADDISON A., *L'économie chinoise. Une perspective historique* (中国经济的历史展望), Paris, OCDE, 1998.
- REYNAUD A., « L'organisation de l'espace de la Chine : l'importance des régions littorales » (中国空间结构：沿海地区的重要性), in DOMINGO J., GAUTHIER A., REYNAUD A., *L'Espace Asie-Pacifique*, Bréal, 1997.
- RUI B., « Le développement de Pudong, symbole important de la réforme de la décennie 90 » (浦东开发：90年代改革的重要象征), *La Chine au présent*, 2000, p. 10–13.
- SANJUAN T., « Hong Kong et son rattachement à la Chine continentale » (香港及其对中国大陆的依附), in HOUSSEL J.-P. (ed), *Les quatre dragons d'Asie*, *Historiens et géographes*, 1996, no. 355, p. 237–254.
- SANJUAN T., *A l'Ombre de Hong Kong. Le delta de la rivière des Perles* (香港影响下的珠江三角洲), Paris, L'Harmattan, 1997.
- SANJUAN T., *La Chine. Territoire et société* (中国：国土与社会), Paris, Hachette, 2000.
- 《上海统计年鉴》, 上海,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1。
- SIT V. F. S., “Hong Kong: Western Enclave on the China Coast” (香港：中国沿海的西方飞地), in SIT V. F. S. (ed), *Chinese Cities. The Growth of the Metropolis since 1949*,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10–231.
- SIT V. F. S., *Beijing. The Nature and Planning of a Chinese Capital City* (北京：中国首都城市的特点及规划), Chichester, Wiley, 1995.
- SKINNER G. W., “Introduction: Urban Development in Imperial China” (皇权时期中国城市发展简介), in SKINNER G. W. (ed),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3–31.
- WEBER M., *La Ville* (城市), Paris, Aubier, 1982.
- YEUNG Y.-M., SUNG Y.-M. (eds), *Shanghai. Transformation and Modernization under China's Open Policy* (上海：中国开放政策下的转变与现代化),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6。
- 《中国统计年鉴》,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本文原载：*Hérodote*, no. 101, 2001, Paris, p. 153–179.